



当AI歌手当道

音乐综艺如何以“真声”唤“真心”？

记者 张洁

为节目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关注度。

彭侃分析认为，两档节目的集中回归，是行业在经过前几年的调整后，对如何重塑兼具社会价值与市场影响力的内容形态所作出的积极回应。节目通过强化专业导向、主流价值与文化内涵，实现了更为柔性的价值引导，为当前略显疲软的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在选手构成与音乐类型上偏重民族、美声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流行元素的比例和大众接受的广度，但其文化价值不容小觑。从北方胡同歌谣到岭南婉转曲调，再到西北草原牧歌，尤其是新疆“歌舞之乡”特色与广东潮汕客家歌曲的登台，使得节目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功能，成为挖掘地域音乐文化、活化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华语音乐文脉的重要平台。

此轮音乐综艺的“同台对垒”，清晰映射出行业在技术迭代与流量主导的时代背景下，于政策要求、市场效益与文化使命之间寻求新平衡点的探索轨迹。它们的实践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共识：在繁杂的娱乐表象之下，音乐作为艺术的公共属性、本体价值及其引领作用，正在被重新唤起并得到强化。

寻找音乐综艺价值

谱写那些无法被计算的人间真情

当技术能够模拟“完美”，当算法可以生成旋律，音乐综艺的价值何在？答案或许正蕴藏于那些无法被计算的人间真情。

舞台的聚光灯下，音乐剧演员遇泓羊闭目吟唱《欠父亲的话》。那些未能说出口的告白，那些永远错过的最后一面，在旋律中缓缓流淌。镜头扫过评委席，那英悄然摘下眼镜拭去泪痕，华晨宇转身背对镜头，何炅的声音微微颤抖。这一刻，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消融，所有人共同沉浸在这种深切的情感共鸣中。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音乐综艺悄然扮演着情感连接器的角色。它们已从单纯的才艺展示，进化成为集体情感体验的载体。山东小伙子薛琦在节目中坦诚分享因肤色而自卑的成长历程，他的歌声与故事相互印证，完成了一场公开的自我救赎；《中国好声音》中，单亲妈妈用歌声诉说对孩子的挚爱，《声入人心》里，学院派歌手倾吐坚守艺术理想的艰辛。这些真实的人生片段，让音乐超越了纯粹的技术竞赛，成为沟通心灵的桥梁。彭侃表示：观众在欣赏旋律的同时，更在聆听他人的生命故事，并在其中照见自己的影子。这种深层次的情感联结，正是音乐综艺能够持续吸引观众的魅力。

近年来，在AI(人工智能)技术持续改写音乐创作规则的当下，网络上涌现出一批由AI作曲、作词、演唱的音乐作品，其中部分作品获得了流量和口碑双丰收。

与此同时，2025年第四季度相继亮相的《中国唱将》与《声鸣远扬2025》，则展开了一场音乐综艺节目价值回归的探索。这两档节目的同期亮相，折射出行业对音乐价值与未来发展路径的深度思考。



如何重塑？一个技术上无懈可击的AI作品，与一个情感真挚的人类作品，究竟哪一个更有价值？“有AI辅助创作后，我们比的不再是谁能更好地执行，而是谁拥有更不可替代的创意和更打动人心的真情。”杨愷表示，在《声鸣远扬2025》《中国唱将》等节目中，真情与创意正成为新的评判导向，这些舞台将更加聚焦“人的价值”。

当技术呈现的“完美”触手可及，比赛的焦点将回归到那些技术无法替代的深层人性价值。“我们比的将不再是‘完美’，而是‘动人’；不再是‘技术’，而是‘灵魂’。”杨愷解释道，人类的魅力恰恰在于那些不完美的真实瞬间——一次气息的轻微颤抖，一个即兴的装饰音，一句带着哽咽却情感爆发的演唱。这些细微而不可预测的瞬间，才是直击人心的关键。

AI技术不会只是音乐综艺的“点缀”，而是会重塑其制作与观看模式，开启“人机共创”的新叙事时代。杨愷描绘了这样的未来图景：选手不再仅仅是歌手或乐手，而是升级为“音乐导演”，他们用AI打造最具个人风格的作品。观众欣赏的不再只是歌喉，更是选手作为“音乐总监”的创作思维和独特品位。

节目的表现空间也从“舞台”延伸至“创作后台”，选手在AI工具前的选择、尝试、灵感迸发的瞬间，都将成为节目内容，全方位展现艺术创作的魅力。“节目的终极价值在于回答：在机器无所不能的时代，什么才是人类独一无二的珍贵？是那些无法被计算的情感、抉择和灵魂的碰撞。”

未来，AI音乐将进入更具创造性和交互性的新阶段。多元化融合发展正成为时代和市场需要的人才特质，音乐产业也将因AI的出现催生一系列新兴职业。杨愷预测，“音乐编辑”等行业将迎巨大发展潜力。“合理运用AI创作，取其精华并改进不足，将个人特色与AI科技结合，这种融合产生的作品艺术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技术的浪潮也带来诸多挑战。版权与作品归属问题首当其冲。“AI模型使用海量现有作品进行训练，其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侵权？版权如何划分？”这些都是尚待厘清的“灰色地带”。与此同时，当创作门槛大幅降低，追逐流量的同质化作品可能如潮水般涌来，“听众的注意力将日益碎片化，难以建立真正有深度的音乐审美。”杨愷对此不无担忧。

当AI成为创作者，我们评判音乐的标准又该

非遗薪传

百年传承：从芦家靴铺到“踏东来”

戏曲鞋靴手工制作技艺的源头，可追溯至甘肃省民勤县的芦家靴铺。清光绪年间，先祖芦半山在天津照料一位患病老者，因此获赠老者家传制靴技艺，自此开创“芦家靴铺”，专攻戏靴、朝靴。经过芦半山不断努力探索、勤奋劳作，鞋靴的样式、图案都有了改进，远销陕西、新疆、青海，许多戏曲艺人都慕名前来定做，声名远播。经过几代人传承发展，这项技艺留在了天津。1980年，天津成立刷装厂，武清区石各庄镇的刘术岩拜宋云城为师，成为第四代传人，其徒赵树清（赵凤彬之父）作为第五代传人，在村里成立“靴子组”，承接刷装厂订单。尽管1988年刷装厂倒闭，梁各庄的靴子组仍坚持接单，延续着这门手艺的血脉。

2013年，赵凤彬正式从父亲手中接过衣钵，成为第六代传人。从此，这位年轻人与百年技艺的命运紧密相连。“其实我并不喜欢这个行业，”赵凤彬坦言，“但传到我这代，家里就我一个孩子，我不能让这门手艺断了。”2013年5月，赵凤彬辞去工作回乡学艺，起初因“枯燥、收入低、销量不高”而挣扎。彼时，全国仅有三家戏靴作坊，行业凋零、认可度低，赵凤彬制作的鞋靴更是少人问津。

然而，一次“绣花机危机”彻底改变了赵凤彬对该行业的态度。那是一台从祖上传下来的老式绣花机，也是制作鞋靴传统纹样的关键，但其核心部件损坏后无人能修。赵凤彬专程赴天津宝坻区学习编程，尝试用电脑绣花机替代老式绣花机，却仅能还原80%的纹样效果。最终，赵凤彬辗转找到北京一位退休老师傅，二人联手修复了这台“镇店之宝”。“这台机器可追溯至工业革命时期，全国可能仅此一台”，赵凤彬感慨道，“它承载着传统戏靴纹样的精髓，也是我在戏曲鞋靴手工制作技艺上的根基。”

从那以后，赵凤彬沉下心来，与父亲一起研究戏曲鞋靴制作，将现代审美融入鞋靴纹样设计，并改进鞋靴制作工艺。赵凤彬不断地努力创新，使鞋靴更加结实耐穿，不仅增加了鞋靴穿着的舒适度，也兼顾了外形的精美。2019年，赵凤彬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踏东来”戏曲鞋



在戏曲艺术的璀璨星河中，戏靴虽不似华服夺目，却是戏曲演员“足下生辉”的灵魂所在。在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梁各庄村，一门始于清光绪年间的古老手艺——戏曲鞋靴手工制作技艺，历经六代传承，至今仍在39岁的赵凤彬手中熠熠生辉。作为这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以青春坚守古老技艺，以创新赋予传统新生，让“踏东来”戏靴走向全国舞台，也让世人看见非遗在当代的蓬勃生命力。在赵凤彬手中，戏曲鞋靴不再是冰冷的道具，而是承载历史、凝聚匠心的艺术精品。

赵凤彬 一针一线为戏靴赋魂

记者 徐雪霏

靴，将销售渠道扩展到了全国各地，产品深得广大戏曲爱好者的喜爱，也得到了专家的高度评价。在天津古文化街的“梨园阁”“最艺阁”里，中外游客都能欣赏到这些精美的手工戏靴。“这就是文化传播。”赵凤彬说，“每卖出一双鞋，就多一个人了解这门手艺。”

匠心守护：从遵循古法到守正创新

据赵凤彬介绍，在戏曲衣箱体系中，存放戏靴的道具箱被称为“三衣箱”，亦称“靴包箱”。箱中所纳的戏靴，大致可归为靴、履、鞋三大类，既包含生、净、丑等男性角色的各式鞋履，也涵盖旦行（包括丑扮彩旦）女性角色登台所用的步履；既有文武官员所穿的厚底靴，也有平民日常所用的便鞋；既有适用于翻腾武打的通用打鞋，亦有孙悟空这一特定角色专属的“猴跳鞋”。戏靴的选用严格依据人物身份与服饰风格而定，不同靴鞋服务于不同角色，并与相应的戏装形神协调搭配。例如，厚底靴作为男性角色普遍穿用的高腰靴，专为表演与舞蹈设计，不仅角色更显雄伟挺拔，也经过去艺术夸张的蟒袍、大靠等戏装在视觉上相得益彰；而女性角色所着的彩鞋，虽形制近似日常便鞋，却常缀以彩穗、绣花等装饰细节，以细腻笔触强化角色的美感与舞台表现力。

赵凤彬对戏曲鞋靴的制作，始终紧扣舞台演出的实际需求。戏靴在选料上尤为考究，为达到最佳的舞台吸光与避光效果，他如今多采用云锦、宋锦、蜀锦等名贵织锦，甚至引入“织中之圣”缂丝作为面料，使鞋靴在灯光映照下呈现出更为饱满、高级的视觉质感。

在坚守传统工艺精髓的同时，赵凤彬亦勇于突破与创新。他将父亲制靴时惯用的京绣改为苏绣，正是因为看中后者更为丰富细腻的针法体系。赵凤彬解释道：“京绣以平绣为主，而苏绣讲究平、齐、细、密，匀顺和光、层次分明，更能表现出纹样的灵动与精致。”此外，他还在传统龙纹中融入八宝、祥云、蝙蝠等吉祥元素，以精巧构图传递出更丰厚的文化意蕴，让每一双鞋靴都成为舞台上的视觉亮点。

而对鞋靴纹样的大胆创新，还是源于赵凤彬一次难忘的制鞋经历。2021年，赵凤彬因友

人推荐结识郭德纲，为麒麟剧社定制戏靴。初次见面，郭德纲惊讶于这位制鞋师傅竟如此年轻，并鼓励赵凤彬：“放开手脚去干，大胆创新！”

这句话让赵凤彬陷入沉思，“那一周我什么活都没干，一直在想：到底该怎么创新？因为在此之前，我制鞋都是严格遵循传统技艺，从没有改变过。”后来，一位朋友的话点醒了他：“中国五千年历史，难道找不出适合戏曲鞋靴的纹样？”由此赵凤彬潜心研究夏商周至清末的纹样，将青铜器、石刻、织锦中的元素融入设计，开创出独具特色的“踏东来”纹样体系。如今，赵凤彬仍与麒麟剧社长期合作，为郭德纲、陶阳等演员制靴，这段经历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创新不是凭空想象，而是要扎根传统再生长。”

在赵凤彬的创新清单上，最具突破性的莫过于他首创的“分左右脚”戏靴。传统戏靴的鞋帮呈直筒形制，左右脚完全相同，长期存在着“不跟脚”的穿着体验。“武生演员在完成腾空、翻身等高难度动作时，一双不合脚的鞋无疑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赵凤彬边说边拿起新旧两款鞋对比。为此，他大胆重构鞋帮设计，在精准贴合脚型的同时，丝毫不损舞台造型的美感。这一变革，既显著提升了表演者的安全系数，也令赵凤彬成为全国行业内独树一帜的革新者。

自戏曲鞋靴诞生以来，制靴匠人们始终恪守纯手工制作的传统。其纹样、色彩与形制，皆



以历代服饰典制为源，经数代制靴艺人的研习、传承与创新，至今已凝练为一套严谨、系统的工艺流程。正因工序繁复、标准严苛，这门手艺对制作者的技艺功底要求极高。在赵凤彬的工坊中，老师傅们平均从业年限已超过三十年，“最长年长的师傅在我六七岁时就已经在做鞋，如今已年过花甲。”赵凤彬说。

尽管戏靴是戏曲表演的刚需，但全国坚持手工制作的作坊仅剩两家。赵凤彬说，“年轻人生挣钱慢、枯燥，坐不住。”他曾收过一名徒弟，但对方因“太难”而放弃。在他看来，行业困境源于三方面：专业性强、盈利周期长、年轻人缺之恒心和毅力。

2022年，戏曲鞋靴手工制作技艺入选天津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近年来，非遗身份为“踏东来”戏曲鞋靴带来了更多的关注与扶持。“算是镀了层金。”赵凤彬坦言，“现在我们有了非遗政策扶持，也有了更多宣传展示的机会。”但赵凤彬清醒地认识到：“踏东来”发展的关键还是在于产品本身，不是顶着非遗名号就能生存下去的。

面对未来，赵凤彬有所担忧，但也乐观面对，“只要有戏曲，这门手艺就不会消失。”他说：“戏曲服饰制作传承断层严重。如果没有入学，谈何传承？如今高校少有戏曲服饰设计专业，我希望戏曲服饰设计这门课程能进入高校一些相关专业的教学计划，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这门手艺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绝迹。戏曲是国粹，戏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它在新时代继续‘踏东而来’，走向更远的舞台。”